

1946 年的军鞋账

姜频收藏者姜建生手中，有一份1946年前后静乐县二区石家庄行政村（今属姜频县杜交曲镇）上交公粮、公草和军鞋的账簿，账簿纸质为麻纸，共有各种账目40多页，全部以毛笔填写。其中有一页是军鞋账，内容为：

“静二区石家庄行政村三十五年代做军鞋统计表6月份填。”该行政村共辖“石家庄、官庄、蒲峪、小河沟、小泉沟”五个自然村。填写有“原派鞋数、每双发布、每双颜料洋、领布洋人”等4个项目。表格下面的说明文字为：“每双发白布伍尺壹寸，颜料本币壹佰伍十（拾）元，当时发给各村，石家（原文缺庄）每壹间拾双。”

间是当时的村级行政建置。1917年10月，阎锡山政权山西省行政公署制定《乡村编制简章》，建立编制制。编村分成若干“间”，每间约25户。1946年，编村改为行政村，行政村下辖自然村，间建置撤销。石家庄编村应交55双军鞋，说明该编村当时有农户1300多户。

当时姜频地区属静乐县二区、六区和五区的一部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太原及山西其他地区还被阎锡山政权盘踞着，姜频地区作为老解放区，群众拥护和支持人民军队的重点也相应从抗击日寇转为支援前线。包括姜频地区在内的静乐县组织和动员群众为山西全境解放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先后参加过晋北、忻县、晋中、太原战役的支前工作，声势十分浩大。姜频群众做军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群众做军鞋，虽然人民政府能够给予一定的资助，但这种资助是远远不够的。做一双鞋，除资助的白布，颜料钱外，还需要大量的布次（碎布头）、麻绳、棉线等。在那个生活物资紧缺的年代，这些东西都是十分缺乏的。而且做鞋十分费工，要经过打格襻、粘鞋、纳鞋、鞣鞋等多个程序。一名妇女要做一双结实的能够适应长期作战奔波的军鞋，没有十来天的时间做不成。可见群众做军鞋需要付出多大的奉献。

《抗战日报》1945年9月28日报道《静乐韩家沟妇女两天做军鞋二百双》：“全行政村又于两天内交公粮两千余斤，完成军鞋一百八十八双，老汉刘祥、刘吉等纷纷出材料多做军鞋，总共自愿出材料多做军鞋有七十双。”事实上和交公粮两千多斤一样，做军鞋也是因为地方支前工作做得好早有准备的，两天根本做不出二百双鞋来。《晋绥日报》1946年8月17日报道《静乐努力部队供给五千双军鞋上前线》：“为保证前线部队供给，七月底，县上曾派出三十余名区干部，分头下乡集中军粮军鞋，设置慰劳站。二区凤凰村妇女，得知我军胜利消息，异常高兴，日夜赶做军鞋，十日间，全县即集中五千双军鞋，全部送往前方。”

踊跃做军鞋 支援子弟兵

张贵桃

工艺精美的北齐鸡首壶

李慧莲

龙柄鸡首壶因以鸡首作壶嘴而得名，故又被称为鸡头壶、天鸡壶。在太原市博物馆展示着一件青釉色的龙柄鸡首壶，是不可多得的一件北齐“明”壶。

何以为“明”壶？这要从它的功能是作为明器来说。这件龙柄鸡首壶出土于晋源区王郭村西南一公里的北齐娄睿墓，墓主人娄睿出身北朝拓跋鲜卑望族，是北齐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同角度的青釉龙柄鸡首壶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发，而鸡首壶的“鸡”与“吉”同音，寓意吉祥安宁，寄托了当时人们对于生活安定的热切期盼，所以鸡首壶这种独特造型就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器类别里一个极为重要的器型。虽然在南北朝时期，鸡首壶已经开始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壶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从现有北齐留存下的鸡首壶研究发现，因其没有流口（壶与鸡首之间不相通），所以更多的是专门用来作为陪葬品的明器。在《风俗通义·祀典》中称：“帖鸡于户，魃五类自然退伏。”在古人看来，鸡具有“辟邪”功能的同时，更是传统文化中的“灵禽”之一，被赋予了光明和镇邪的寓意，以选择它来作为明器。

龙柄鸡首壶通高49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12.8厘米，盘口，圆唇略微上敞，龙口衔圆唇，龙颈连接腹部，龙颈细高，平折肩，鼓腹，下凹腹内收成了一个略小一些的浅平底。实心的小鸡头在肩的前端，与之相对肩的后面是并列着两条实心细高龙颈柄。龙颈部的上方饰有鬘，在肩部两侧各装饰有一对花瓣三角形圆孔系。壶颈较高，雕刻有四道弦纹。在龙柄和鸡头之间有莲瓣形二钮，四个系钮下垂忍冬。在腹部起棱，将鸡首壶腹部分为段，非常具有立体感。棱腹下贴伏着四只展翅小凤鸟，下腹逐渐内收，平底。鸡首壶胎质厚略粗且坚硬，通体施黄绿釉，釉面晶莹光亮，有少量浅冰裂纹。鸡首与龙柄的龙头造型一高一低，遥相呼应，既显得生动形象有趣，又增加了其外形的曲线感和灵动性。由于龙柄的位置略高于壶口，使

得整体及整个壶体轮廓上显得更加圆润修长。此壶造型线条简洁大方而新颖，釉色均匀光亮而莹润，反映了北朝时期烧造青瓷艺术的较高工艺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青釉龙柄鸡首壶运用了多种精雕细刻的纹饰技法。在鸡首壶的表面堆雕了花瓣三角形圆孔系、莲瓣形钮、凤鸟、垂束莲和忍冬纹图案，刻画了颈部弦纹等，如此以多重堆塑装饰手段来完成的纹样装饰，十分生动地表达出了当时的人们对“群生虫豸皆有灵”这一观念的认同。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因此，象征着生命不息、解脱贫穷和疾病、趋吉辟邪、平安喜乐的佛教纹饰垂束莲、忍冬纹等图案就流行起来。

出土于娄睿墓的这件青釉龙柄鸡首壶，无论从器形上，还是从釉色、装饰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它不仅是北齐鸡首壶的代表之作，更是陶瓷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又见可汗王碑

刘勇



吕梁市中阳县太高村可汗王碑（作者供图）

2023年盛夏，我在吕梁市中阳县太高村访得又一通与可汗有关的碑刻，这也是中阳境内发现的第四处可汗文化遗存。其余三处为上顶山可汗庙、殿则村可汗庙遗址、下枣林村大局则庙有可汗神。

太高村，在今中阳县城北约5公里处的南川河东岸台地上。村中有一座翻建龙王庙，庙内有一通圆首残碑，高约80厘米，其中碑首部分高约35厘米，厚约23厘米，宽约68厘米。碑首大书“可汗王碑”四字。碑文部分的碑面斑驳风化，字口较浅，初步识读出部分铭文：

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重立石碑……太高村口纠首刘达……刘口甫……刘元口……至大四年五月……

由铭文可知，明嘉靖二十年（1541），太高村民集资重立可汗王碑。今村名仍为太高，可知此名至少明代已有。此碑文可能是集资立碑的功德主名单。碑

的另一面现为凿痕面，无法判断原内容。

元至大四年（1311）是元武宗海山年号。一般碑文的最后一列为立碑年款，此元代至大四年年号应是立碑时间，但似乎与前部铭文记述的“嘉靖二十年重立石碑”相矛盾。

仔细观察，可见前数列铭文刻字较浅，字径、书体相近，而最后一列铭文较大，且与碑首铭文书体相近。有可能元代至大四年时已立有可汗王碑，明嘉靖二十年重修时再立碑，但因故未做新碑，而是在元碑基础上抹去碑文重刻，元碑的年款未一并去掉。

由此可见，元朝时此地应已有祭祀可汗场所。因年代久远，神主被称呼为可汗王。

可汗崇拜在中阳南川河流域已有多处，如殿则村元代可汗神庙后名为可汗大王，具有龙王庙的祈雨功能；上顶山可汗庙清代也称为可汗龙王庙。此处可汗崇拜很可能也被民间赋予了祈雨功能。

此可汗王残碑置于龙王庙内已有多年。有村民说是在早年修渠时挖出。但结合多地可汗崇拜在现实中的祈雨功能，推测此碑最初可能即在此龙王庙中，龙王庙最初可能是可汗庙或可汗龙王庙，神主是可汗。元代的重修碑即此残碑。

元明时的太高刘氏因何供奉可汗神？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梳理吕梁中古民族史的发展过程，我们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东汉末年以來，南匈奴定居吕梁，西晋末年单于后裔改姓刘氏，建立十六国中的匈奴赵国。此后，南匈奴的后承者稽胡一直生活于此。太高刘氏祖先很可能由南匈奴——稽胡——鲜卑——汉，逐渐融入中古时期的新汉人群。这一胡汉融合族群的祭祖神庙，部分以各类形式的刘渊神庙面貌传承，部分则以可汗神庙的名称延续。更多的可能则是龙天庙，是胡汉风俗结合的产物。

太高可汗王庙大体可能是这样传承下来。吕梁一带的可汗崇拜，反映了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

文殊塔，位于清徐县马峪乡碾底村东北的龙林山梵宇寺北侧山岗上，建于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为石砌二层方形佛塔，造型古朴，近年修复。2000年，太原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为第二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5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殊塔坐北朝南，台基边宽10.78米，通高11米。占地面积101平方米，全部由大小不一的沙岩迭砌而成。塔身分上下两层，均施石刻飞檐。上层周雕佛龕、石刻造像、花纹等图案，四周出檐雕莲花瓣，宝顶为圆形花瓣，周雕人面；下层面南，塔身开洞，内塑文殊菩萨，塔门楣镌火焰形券拱，塔身砌石接缝由纺锤形铁锁卯契勾拉。文殊塔整体造型类属金属式，是举行礼佛仪式的“支提”，类似于庙宇形式。从其材质、造型及工艺，判断该塔为典型的中期唐代作品，北魏造构。

文殊塔建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由于长期雨水冲刷，导致基础下陷，加上人为破坏，塔身严重倾斜，部分塌陷，塔刹已毁，塔中部因裂痕0.5米，向东倾斜。

据塔所在寺内《北汉天会石碑》上铭文描述，造塔人为凝之，身材魁梧，气度不凡。游历了五岳，来到龙林山，好像回归故里。他忆及父母兄弟时，池内映出五台山景色，变化之间，他想：龙林山不亚于五台山清凉之境。于是他丢弃俗念，要在此处造文殊石塔一座，以表心迹。他从唐贞元十一年（795）开始筹划，到唐贞元十三年（797）开工建设，10个月建成，便在这里矗立起这座雄伟石塔，僧俗之人齐声赞美。

1994年，太原市文物局委托清徐县文管所和碾底乡政府对该塔进行修葺。在维修过程中石匠师傅们严谨地利用石物原件，依照文物修旧如旧的原则，巧妙地保持原来的唐代风格，共用到大石360多块，垒了32层，原塔室内的镇物都放回原处，铁锁也按原样安装，历时8个月，顺利完成了维修任务。

山西有古塔600余座，占全国古塔的20%。有阁式、藏式、密檐式、塔柱式、金刚式五类，材料上又可分砖石、铜、铁、木、琉璃等类，清徐文殊塔因其结构形式独特，造型美观，历史悠久，兼具区域特色，因而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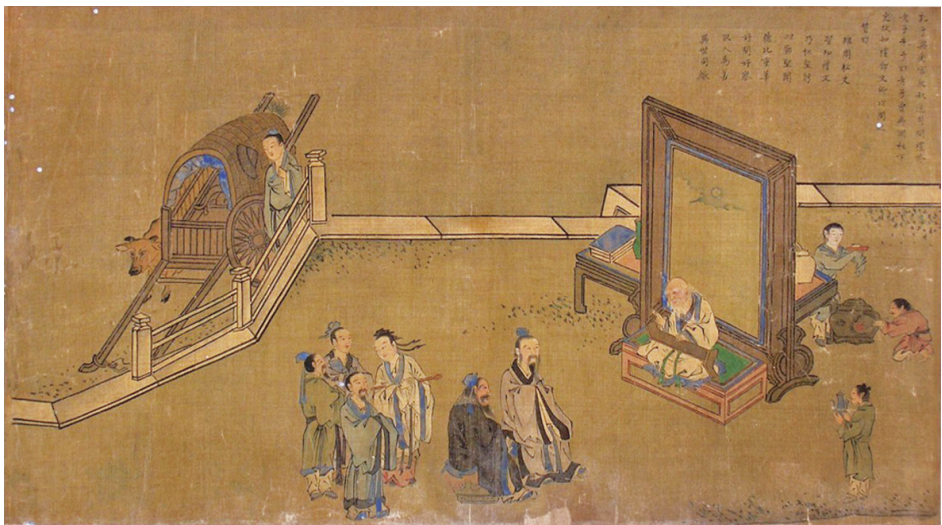


清徐县龙林山梵宇寺内的文殊塔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百度

问礼老聃 尊师好学

静石



《孔子圣迹图》第9幅《问礼老聃》（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博物馆藏）

“三人行，必有我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古以来，尊师重教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收藏于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博物馆的《孔子圣迹图——问礼老聃》向我们展示了孔子也曾作为一名谦逊的学生向老子请教时的情形。

由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博物馆所收藏《孔子圣迹图》三十六幅为明代彩绘绢本，又称《三十六孔圣迹图》，该图以连环画形式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其中第9幅为《问礼老聃》。

作者年代不详，根据图前题跋，大致创作于明代成、弘治年间。《问礼老聃》为《孔子圣迹图》中的第9幅，所绘内容为孔子向老子求教时的情形。孔子34岁时，曾游历周都洛邑并向老子问学。画中孔子端坐于老子面前，专心聆听宣讲。画心右上角有文及赞，曰：“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朱子曰：‘老子曾为周柱下史，故知礼节文，所以问之。’赞曰：‘维周柱史，习知礼文。乃枉圣躬，以廓圣闻。德比重华，好问好察。取人为善，异世同辙。’”

问礼老聃的故事在《史记》中有记

载。大致意思是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国守藏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白道德之精要。我想去洛邑向他求教，你和我同往吧。”南宫敬叔欣然应许。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引领孔子看祭神的典籍，观庙会礼仪，使孔子获益不浅，感叹不已。逗留数日，孔子向老子辞行，老子赠言道：“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财物，仁义的人送人箴言。我不富有，没有财产送给你，只有几句相送当作忠告：当今世上，既聪明而善于观察的人，他之所以会遇到危难或濒临死亡的危险，在于他喜欢讥讽别人的过错；既善于辩论而又通达的人，之所以经常给自己招来灾祸，在于他经常毫不掩饰指出别人的缺点。作为子女，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作为臣子，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君王还聪明，望你谨记。”孔子点点头说：“学生一定铭刻在心！”孔子谦虚好学，时时求学，逐渐学识渊博起来，弟子也越来越多，为人敬仰。

两千多年前孔子求学时“学而不厌”，为师时“诲人不倦”的态度，为后人树立了榜样。